

边疆地区面临的民族分离危机来思考问题，故而从学术层面构建中华民族绵延不绝的历史，希冀能够将边疆、民族统合到一个共同的民族国家框架之内。历史学家顺应时势，在学术与政治之间架起了桥梁，他们用最为简单明瞭的方式大胆回应社会迫切关注的边疆、民族问题，因而收获了普遍的欢迎和掌声。但对于一些民族学家和民族志社会学家来说，民族与政治间的紧张让他们感到不安，毕竟，“中华民族是一个”意味着同化，若在同化方面要求过于严格，可能会使那些被同化的边疆民族感到沮丧；并且，这一同化策略有可能强化某些边疆民族的地方民族主义，——这些民族主义以族群认同或文化认同为号召，在事实上则会割裂中华民族认同，于是，他们提出，与其说将政治民族的界定莫基于“一个国家，一种文化”的共同性假设之上，不如将“民族平等，文化多元”作为认同“中华民族”的基础。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民族学家与历史学家在学术观点上未能求得一致，但建立在前述讨论、研究的基础之上，时人逐渐认识到，历史上的华夏边缘群体在民族国家时代已经被赋予极大的重要性，民族主义在动员大众的政治活动中能够迸发出强劲的力量。于是，他们开始基于中国边疆本位的历史观，从“在地化”的视角出发，重新审视边疆社会与边疆民族，并尝试从学理上检讨传统的“华夷之辨”，进而将边疆社会与边疆民族置于更加崇高的历史地位。

【论 文】

学术与政治：

“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讨论与西南边疆民族研究¹

王 传²

摘要：围绕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展开的论辩，与泰国改国名造成中国西南边疆的危机感紧密相关。傅斯年、顾颉刚鉴于当时背景，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内部不应再析出什么“民族”及使用“民族”一词，也不要以各“民族”之名做研究，以免造成分离危机。费孝通和一些南方学者从民族学的学科立场出发，坚持“中华民族”应该包括西南边疆诸族，民族研究不会弱化各族对于“中华民族”的认同感，还有益于民族政策的制定，学术与政治可以有有机合一。

关键词：西南边疆、民族危机、傅斯年、顾颉刚、杨成志

近年来，学界对抗战时期有关“中华民族是一个”的争辩时有讨论，^[1]然其焦点多集中在顾颉刚、白寿彝、张维华、费孝通、翦伯赞等人身上，认为除费、翦二人之外，余均同意或发挥了顾颉刚的观点，或者从学理角度来研究“中华民族”构成问题。其实，当年对该论题发表意见的学者远不止这些，还包括如杨成志、胡体乾、吴宗慈、江应樑等从事西南民族研究的南方学人，都为此发表过不同意见，惜迄今未获应有的重视。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充实相关史料，“详人所略”，结合彼时国内外政治局势和论辩各方所持的具体语境，从更广的视野上，揭示其中折射的学术与政治，及其他错综纠葛的社会因素，以加深对民国学术史某些特点的认识。

¹ 本文发表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8年第2期，第168-177页。

² 作者为历史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师。



一、暹罗更名与西南边疆危机

围绕着顾颉刚提出的“中华民族是一个”展开的这场论辩，与1939年暹罗更改国名引起的西南边疆危机感有直接关系。暹罗改名为“泰”，表面观之，与明初高丽改称“朝鲜”，清中期安南改称“越南”类同，似无新奇之处，然细察之，却并非如此简单。^[2]

暹罗本为君主专制国家，第七世国王蒲莱吉波克是位绝对的亲英派，然1932年6月4日，国内少壮派军官发动政变，政权落入人民党之手，暹罗过渡到立宪君主政体，英暹关系从此衰落，日暹关系则迅速升温。^[3]“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在政治上极力拉拢暹罗，目的无非是使暹罗“同情”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以免在国际上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1933年初，在国联召开谴责日本占据中国东北的会议表决中，其中42票赞成，1票（日本）反对，仅有暹罗弃权，暹罗此举引起了英美等国的惊异。^[4]

在日本的怂恿下，暹罗投入日本法西斯的怀抱，开始以激进的“爱国主义”宣传来塑造暹罗。^[5]1938年，少壮派军官批汶颂堪自兼国务总理，对外奉行反华、亲日、疏英法的外交策略。与此同时，文人阿谀附和军人政府，高唱“大泰族主义”，其中历史学者威集瓦他干是策动改国名的幕后主使人。1938年，他发表公开演讲，斥责华侨不利于暹罗，尤甚于犹太人不利于德国，并称泰族在中国西南等地人口是暹罗全国人口2倍多，这些人“但闻暹罗有泰人则喜”。^[6]目的在于宣传暹罗与中国境内的傣族同根同源。1939年5月，威集发表广播演说，“在促起泰族人对于自身之独立自由而感到欢欣，并促而团结合作，领导泰族进于繁荣之域”。^[7]相比威集的演讲，批汶颂堪在征求更改国名意见时，言辞更加直接，谓：“在中国居留的泰族人，与汉族比较疏远，有一部分甚且划定区域，不受任何方面之统治。”^[8]

国人对于日本策划建立伪“满洲国”和华北五省“自治”的阴谋仍心有余悸，此时全国的政治、经济、文教中心虽已移至西南，然而，即便苟安边隅，也未能避免日本支持暹罗分裂中国西南的阴谋。事实上，早在暹罗正式改国号之前，傅斯年以其独有的政治嗅觉，便对暹罗政治宣传的用意做出了明确的判断。1939年2月1日，傅斯年在写给顾颉刚信中道出了他的担忧：暹罗宣传滇桂是其故居，妄图收复失地的言论，将会酿成西南边疆的危机。并进而指出其担忧的根据。他认为抗战后的西南在政治上的重要地位不言而喻，云南人自己承认“只有一个中国民族”，而不少羁旅在西南的学者，不必借民族研究之名巧立各种民族的名目。日本人在暹罗宣传桂、滇为泰族故居，而鼓动其收复失地，如果学人继续“巧立民族之名，以招分化之实，似非学人爱国之忠”。^[9]

然而，与傅斯年的政治警觉恰恰相反，顾颉刚此时正在昆明的《益世报》上主编《边疆周刊》，定期登载分析西南各族的文章，所以他正是傅斯年所谓“巧立民族之名”的一名学者。顾颉刚在2月7日的日记中写到：“昨得孟真来函，责备我在《益世报》办《边疆周刊》，登载文字多分析中华民族为若干民族，足以启分裂之祸！”^[10]由此可见，此时的顾颉刚并未注意到在民族危难之机，刊载研究西南民族的文章也会带来潜在的政治危险。

基于现实的考虑，为了避免学界的研究引起国家分裂的危险，傅斯年在信中提醒顾颉刚在西南地区谨慎使用“边疆”与“民族”两词，并建议顾氏今后废止“边疆周刊”中的“边疆”一词，而改用“云南”或“西南”；研究的内容应限定在地理、经济、土产、政情的范围之内，而“莫谈一切巧立名目之民族”，以免刺激云南当地的“土著居民”，甚至为复杂的境外势力所利用。为达到团结抗战的目标，学界应尽力发挥“中华民族是一个”之大义，证明夷、汉是一家。^[11]

事态的发展，应验了傅氏的担忧。1939年6月4日，在少壮派军官发动政变的7周年之际，暹罗正式宣布改国号。同一日，陶云逵著文驳斥暹罗更改国名的依据。他指出暹罗改国名的背后



是日本暗中“施其播弄之术”，暹罗借“民族一体”思想高呼之际，向滇、桂、越、缅伸手。由此，他特别提醒政府当局注意暹罗政治的新动向。^[12]继有陈序经发表《暹罗与泰族》，认为暹罗的大肆宣传必将影响到西南边疆的稳定。^[13]

顾颉刚两次撰文阐述暹罗改国号对中国时局产生的不利影响。1939年9月，顾氏在香港刊文指出暹罗改号是其狭隘的“泰族至高”思想的表现，更名对中国的影响“并不是暹罗改号本身之客观地必须产生的结果，而是由于主观改号之主观的结果。”^[14]著名云南问题专家张凤岐认为顾氏的立论，“和盘托出暹罗改国名之阴谋”。^[15]同年11月，顾颉刚再次发文，重申暹罗改号会直接扰乱中国抗战建国的西南根据地，动摇后方民族的抗战意志，使日本坐收渔人之利，最终实现其独霸东亚的野心。^[16]此外，周钟岳、方国瑜也分别从历史学的角度驳斥了暹罗更改国号的依据。^[17]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也刊出专文揭露暹罗大举排华、帮助日本侵略中国的意图。^[18]

暹罗对大泰族主义的宣传，也引起了国民政府及西南边省官员的密切关注。1940年4月，国民政府饬令云南省政府要“加切注意”，而暹罗宣传的“大泰族主义”，虽然尚未发生实际破坏作用，但足以让贵州省政府主席杨森“不能不承认隐忧重重”。^[19]

毋庸置疑，由暹罗改国号给西南边疆带来的危机，引起了政学两界的高度重视，其直接后果是让傅斯年和顾颉刚开始认识到审慎处理西南民族边疆问题的重要性。只有在西南边疆危机这个大的历史背景之下来认识“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讨论，以免以后出的观念来倒述此次论辩，才能更加接近于历史的本真。

二、人情世故与学术歧见

顾颉刚在日记和《中华民族是一个》中均表示：“老朋友”傅斯年的“责备”，是他写作此文“以告国人”的直接原因。同时，他也指出，傅斯年对民族问题的见解，引起了他的学术“共鸣”。顾氏认为虽然他本人对西南研究不多，但过往的历史经验告诉他，日本人曾假借“民族自决”的名义在东三省硬造一个伪“满洲国”，后又想造出一个伪“大元国”和伪“回回国”，现在“想用掸（泰）族作号召以捣乱我们的西南”，美国总统威尔逊喊出的“民族自决”的口号，竟为日本用于为其侵略的粉饰之辞。^[20]正因傅斯年对民族问题的见解，与顾颉刚“久蓄”于心中的问题相契。因此，顾氏作《中华民族是一个》来讨论废弃“五大民族”的称谓问题“并不难”，前后仅花了三天的时间。^[21]

顾氏在《中华民族是一个》中所要表达的思想主旨，大致1935年傅斯年在《中华民族是整个的》中便已谈及。傅氏认为平津一带“华北五省自治运动”的舆论，不仅伪造民意，更是扰乱人心、破坏国家领土完整的阴谋，应以民族主义的立场，尽法惩治。“中华民族是整个的”这句话，既是历史的事实，更是现在的事实。^[22]傅氏以中原汉族为中心的视角来解释“中华民族是整个的”主张，并没有包括汉族周边若干小的民族，有失偏颇。但是，该文刊出后，由于契合时局的需要，彼时学界多从不同视角出发肯定并发挥“中华民族是整个的”的主张，^[23]并未见有反对的意见。

全面抗战爆发之后，顾颉刚密切关注边疆危机。1939年1月1日，顾氏刊出《“中国本部”一名亟应废弃》。文章指出，由日本传来的“中国本部”一词是敌人分化中国的工具。在中国谈“本部”就让人立刻感到东三省、内外蒙古、新疆和西藏非中国领土，不妨放弃，任由帝国主义侵略。文章结尾特意强调，在废弃“中国本部”一词的同时，“五大民族”的称谓也“必应废弃”。但作者并未继续申述缘由，希望以后再谈。^[24]

直到接到傅斯年的“责备”信后，顾颉刚才在《中华民族是一个》中继续讨论废弃“五大民族”的称谓问题。他在开篇便指出：“凡是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在中华民族之内我们绝不该



再析出什么民族——从今以后大家应当留神使用这个‘民族’二字。该文进而阐述：民族不一定要组织在血统上，也不建立在共同文化上，“只要能在中国的疆宇之内受一个政府的统治，就会承认都是同等一体的人民”；“我们只是在一个政府之下营生活的人，我们绝不该在中华民族之外再有别的称谓”；“我们从今以后要绝对郑重使用‘民族’二字，我们对内没有什么民族之分，对外只有一个中华民族！”^[25]

文章发表后，引起了费孝通的质疑。费氏指出：国家和民族不是一回事，不必否认中国境内有不同民族的存在。国家内部发生民族间的分裂，并非各民族不能共生，根本原因在于各民族间因政治上的不平等。因此，在费孝通看来，谋政治上的统一，不一定要消除“各种各族”的界限，而是在消除政治上的不平等。对于顾颉刚通过宣传“中华民族是一个”，以防止敌人分化的认识，费孝通认为国家的安全和强盛，需要国内各文化、语言、体质的团体在政治上的紧密合作，绝非法取消了几个名词就可以达成。^[26]为了避免在名词上纠缠不清，费孝通没有使用“民族”一词，但他所说的“各文化语言体质团体、分子”等，其实指的就是民族。也就是说，费氏认为“中国是一个包含多个民族的国家”。^[27]

顾、费持论孰更高明，不应简单肯定或否定一方。1940年5月，冯友兰著文批评顾颉刚为倡导“古史辨运动”，竭力打破中国“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证明中国民族出于多元，抗战后意识到日本人利用中国民族多元企图分裂中国，遂又主张中国民族多元之说应该废止。显然，冯氏对于顾颉刚观点的“前后反复”不以为然，进而指出：民族出于一元或多元的讨论实质是“传统”与“历史”之争。一个民族与一个人同样既有其物质上的联接，亦有其精神上的联接。民族的精神上联接，要有历史与传统的支撑。在这个意义上，冯氏强调：“说中国民族是多元底，是依照历史。说中国民族是一元底，是依照传统。”此传统虽与历史不合，但可各行其是，并行不悖。^[28]冯氏之意，在于批评这场争论割裂了历史与传统之间和谐的内在联系。

后来顾颉刚除了继续主张应废除“用名乱实”的“中国本部”、“五大民族”两名词之外，还不忘“率直奉劝”在滇从事人种学和人类学的不要使用“苗民族”、“瑶民族”、“罗罗民族”、“僂夷民族”等名词，以免令“帝国主义拍手大笑”，为他们分化中国施以援手，最终陷国家于分裂的境地。^[29]顾颉刚“敬告”虽未指明具体针对何人、何派？但顾颉刚所提及的苗、瑶、罗罗、摆夷等民族，正是以杨成志及其弟子10余年来最主要的研究对象，其学术成绩有目共睹，学界将他们称为中国民族学研究的“西南学派”。^[30]

既然“中华民族是一个”论题是由于西南边疆民族危机感而引起，所以自然会联想到，对于西南民族研究最有成绩、影响最大的杨成志及其同仁的态度不仅显得十分重要，而且对于进一步认识这场争辩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在杨成志后来发表的系列文章中，其对待“中华民族是一个”所持的立场与顾、傅迥异，但是杨成志为何一直选择保持沉默，直到论战的高潮过去。一种可能的解释在于，杨成志等人所从事的西南民族研究事业，正与顾、傅在中山大学任教期间的积极提倡和扶植有关。

1928年，傅斯年、顾颉刚在中山大学促成了杨成志、史禄国等人参加的我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有计划的云南民族调查活动，开创了“中国学术史上作西南民族之集团研究”的先河。^[31]与此同时，顾颉刚为了提倡西南地区的民族研究，在学界第一次喊出“西南民族研究”这个新名词，并鼓励包括杨成志在内的研究同仁在西南民族研究尚未开垦的新领域，不畏困难、幼稚，“向前！向前！向前！从幽谷爬上平地，从平地升到山巅！”^[32]杨氏也在晚年回忆到，在他进入中山大学工作之后，就“在傅斯年、顾颉刚等领导主持下提倡到‘民间去’，开展民俗学与民族学调查研究活动”。^[33]也正是在傅、顾的积极引导中，杨成志立下“愿以终身贡献西南民族的学问，克苦忍劳，以图有成”的学术宏愿。^[34]



对于傅斯年和顾颉刚敬告学界从事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学者慎用西南民族的称谓，学界一般利用傅斯年给朱家骅、杭立武的信件作为一手材料，认为这些“敬告”针对的是吴文藻及其弟子费孝通。理由是傅斯年认为吴文藻在 1938 年 11 月参与组织成立的云南民族学会提倡西南民族研究，“绝富于危险性”。^[35]事实上，云南民族学会只能算是中国民族学会在战时的特别组织。成立于 1934 年底的中国民族学会，主要由徐益棠、何子星、黄文山、孙本文、商承祖、胡鉴民、凌纯声等人发起。成立之初，会员有 40 余人，包括蔡元培、顾颉刚、杨成志、吴定良、刘咸、吴泽霖、杨堃、吴文藻、江绍原、陶云逵、欧阳翥、李方桂、林惠祥等，均为彼时国内民族学界一时之选。抗战爆发后，中国民族学会会员星散，会务因此停顿，后因昆明人才集中，研究便利，于 1938 年 11 月成立云南民族研究会，公推李济为会长，顾颉刚、吴定良、梁思永、罗莘田等十三人为理事。^[36]傅斯年的师友、同事，如蔡元培、顾颉刚、李济、吴定良、陶云逵、凌纯声等均名列其中。

解放前杨成志和吴文藻齐名，人类学界有“南杨北吴”之说。杨成志既是中国民族学会重要成员，也是成立于 1936 年的中国民族学会西南分会的实际负责人。^[37]傅斯年、顾颉刚所反对苗、瑶、罗罗、摆夷等民族的研究，都不是吴文藻、费孝通师徒的主要学术研究领域。正如前文所述，杨成志及其同事所从事的罗罗、瑶、苗、摆夷等西南民族研究的事业正与当年顾、傅二人的积极提倡有关。傅斯年不遗余力攻击吴文藻及其弟子费孝通，而却绝口不提在西南民族研究领域最具影响力的中山大学同仁，尤其是杨成志及其弟子江应樑等人，内中的人事因素尤为明显。

三、“国族”构建与“民族”研究

南方学者最早著文回应“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是中山大学社会系主任胡体乾。1939 年 6 月，胡氏发表《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认为“民族”一词原是中国用以指称欧美各族，在此之后推及国内各族，其中并无恶意。即使中国学界不用“民族”一词，也不一定就能达到感情融洽、裂痕消除、意志统一的局面。但是，他同时又认为民族政策的达成，辅以适当口号的宣传，也有必要，即在中华民族成为一个的进程中，“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口号，与中国历史上“天下一家，中国一人”、“五族同胞”等说法一以贯之，有利于加强各族同化的信念。^[38]

1939 年 8 月，杨成志发表《西南边疆文化建设之三个建议》，^[39]在第一部分“国族政策与民族研究之分类关系”中不仅指出了顾、费论辩的核心问题所在，还提出了在国族构建中“中华民族”意识与民族研究之间的辩证关系。杨氏强调：西南地区的边疆建设与民族问题的处理不可分割。针对学界对于“民族”认识的混乱，杨成志给出了自己的看法：广义的“民族”是指“世人认同一传统或同一宗教，或同一文化政治，或同一语言，或同一惯俗，或同一意识，或情感之某一人群或集团”，这一概念大约相当于“国族”（Nation）、“民族”（Nationality）的意思；狭义的“民族”一词的使用，与“人种”（Race）相同，均限于生物学或生体学范围内，是指一种自然集团，以探讨民族集团（Ethnic Group）或民族（Ethnic）之真谛，与广义上所使用之国族或民族所含有的政治意义不同，故研究民族的专门学问不称为 Nationalology（国族学），而独称为 Ethnology（民族学）。

在杨成志看来，顾、费二人的文章，其内容几乎充满关于“民族”一词之讨论，二人因立场不同，见解自异，各有所偏，无足为怪，但总体来说颇能代表彼时国内学界对“民族”概念见解的纷殊。作为两人的共同朋友，杨成志指出他们关于“民族”一词观点不同之处在于：费孝通所言民族似近乎 Ethnic，即多偏于客观之民族志（Ethnography）范围；而顾颉刚所言之民族接近 Nation，即倾向于主观民族论（Nationalism）。



后来，杨成志在《民族学与民族主义》^[40]中又进一步阐述：民族学研究的对象是科学探讨的自然民族（Ethnic）；民族主义所注重的是“国族”需要的政治民族（Nation）。杨成志认定“国族（Nation）与民族（Ethnic）之真正含义，可分而又可合”，前者属于“政治支配之权力结合体，而后则为自然或生物之血统集团”。以政治力量使各族团结于主权国家之内，这是二十世纪任何国家所取之一般自然趋势，中国自不能例外。其所不同之处在于，欧美列强采用科学的“民族”研究成绩，以实施其政治之“国家”政策。

杨成志针对“中华民族是一个”问题的讨论，与顾颉刚和费孝通不同之处在于，在坚持科学人类学、民族学的学科态度的同时，并非停留在抽象名词的讨论上，而是把培养国民的民族意识与客观现实联系起来，不仅指出了顾颉刚与费孝通在此次论辩中主要分歧在于对“民族”概念理解的不同，而且颇具创造性地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提出作为政治权力之下的“国族”构建，与作为学术研究的“民族”的研究，不仅可以并存，而且还能有机结合。

1937年，杨成志的研究生江应樑阐述他对研究西南民族一贯见解：中华民族非汉民族可以概括，也不是汉、满、蒙、回、藏五族可以概括，以汉族代表中华民族是绝大的错误，把中华民族分做汉、满、蒙、回、藏五族更是绝大的荒唐。中华民族是一个整体的民族，西南民族则为此整体民族中之一个大支派，^[41]稍后又补充到，西南民族是中华民族整体之一部分，应包括苗、罗罗、僂夷、溪蛮、黎、瑶人。^[42]在《抗战中的西南民族问题》一书中，他谈到在辛亥革命之后，将数千万的西南民族遗弃在“五族共和”之外的做法，“是一种不必掩饰的错误”。整个民族的团结是抗战胜利的基础，而西南民族若不加入团结，不能称之为中华民族的团结，西南民族被遗弃在民族团结的核心以外，直接使抗敌前线缺少大批生力军，间接授敌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机会。^[43]

江应樑在承认中华民族是“整个的”、“统一”的前提之下，又承认多民族存在的客观事实。多年的西南民族研究与调查经验，使江应樑深刻认识到民族调查研究的成果，是开化西南边民的有益参考。他说：“试看近代国家，当其征服一个殖民地时，莫不先以学术专门人才去做国家的先锋，政府根据这些先锋的调查报告，始筹定开发的政策。帝国主义国家之开发殖民地，与我国开化西南民族，目的不同，但初步的工作方法却可采效，因为我们此时再不能承袭昔人的错误，做闭门造车的工作了。”^[44]显然，江应樑与其老师杨成志都是从民族学是一门实用性科学的立足点出发来讨论学术研究对于政府政策制定的现实意义。

四 学术与事功的分合

徐益棠在回顾之“九一八”事变以来十年的边疆民族研究时，认为“中华民族主义之鼓吹”是抗战时期中国民族学发展的重要趋势之一。中国已放弃“尊汉卑夷”等歧视少数民族的政策，如何团结边民，除实际研究与设施外，“中华民族是一个”理论的宣传甚属必要，惟理论宣传的基础，须特别郑重，至少不相矛盾。彼时学界常以学术研究与政治措施分为两途，“在学术上可以分割，在政治上必须合一”之立论，似乎并不适当。在他看来，“学术与政治，如鸟之双翼，车之双轮”，二者不能联系与调整，其他尚复何望？且从学理言之，应改为“在学术上可以合一，‘行政’上必须分割”也。^[45]

徐益棠曾与杨成志同时在巴黎追随法国人类学之父莫斯学习人类学、民族学，他们与同时期在欧洲学习人类学的陶云逵、杨堃、刘咸、吴定良一起，号称人类学“六君子”。^[46]回国之后，徐益棠、杨成志、吴文藻等人共同发起成立中国民族学会，推动民族学研究。后来成立的云南民族学会，则受到傅斯年的猛烈攻击，嘲讽该学会的存在是个“笑话”。^[47]在其攻击之下，该会如“昙花一现，遽而夭折”。^[48]徐益棠的言论，代表了彼时民族学界的一般看法，实际是质疑傅斯



年、顾颉刚所提出的“中华民族是一个”主张，认为他们罔顾事实，取消“民族”研究，以政治需要凌驾于学术之上，不符合民族学研究的学术规范。

中国最早的西南民族研究源于傅斯年和顾颉刚等人在 20 世纪 20 年代末的大力倡导，“西南民族”的概念也正是在他们的倡导下广为学界所知。然而十余年过去了，为何当时的倡导者竟然改变初衷？究其原因，主要与时局的骤然变化，以及彼时傅斯年、顾颉刚亦学亦政的身份有关。

20 世纪 20 年代，顾氏在学界竭力倡导研究学问的人只该“求真”，完全不用考虑应用问题，因为致用是政治家、教育家、社会运动家的任务。^[49]1935 年的“华北事变”后，顾氏的观点发生变化。他认为在承平之世，学术不急于求用，因采取“为学问而学问”的态度，坚持真理，不问功用，犹如富人不必忧心衣食，学问随性所嗜。然当国势凌夷，蹉天踏地之际，所学必求致用，犹如蓬门筚户之家，先图温饱，再求创业。^[50]在他创办的《边疆周刊》发刊词中，呼吁学者不忘研究民族史和边疆史，要将“边疆的情势尽量供给政府而请政府确立边疆政策”，以“共同抵御野心国家的侵略”。^[51]1944 年，顾氏谈及主张“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原因时，其中谈到政治与纯学术研究不同之处在于：学术工作要同中求异；政治工作要异中求同。抗战时期国人“实在不应当横梗族类的成见，贻国家以不利”。^[52]

彼时傅、顾已功成名就，成为国内知识界的代表人物，他们的言论足以影响到整个学界乃至社会的舆论风向，或许他们本身也有不得已之处，但是与政治的靠近也非常明显。朱维铮认为，傅斯年、顾颉刚通过讲“中华民族是一个”，为蒋介石的政治服务，并得到了蒋介石的认可。1939 年 2 月中下旬，国民参政会一届三次会议在重庆举行，蒋介石替代投日的汪精卫任议长，提出《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随即重庆的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全文转载《中华民族是一个》，顾颉刚感到“德不孤也”。^[53]傅斯年更在给朱家骅、杭立武的信中直接痛斥到：“今中原避难之‘学者’，来此后大在报屁股上做文，说这些地方是罗罗，这些地方是夔夷，更说中华民族不是一个，这些都是‘民族’”，“有自决权，汉族不能抹视此等少数民族。更有高调，为学问作学问，不管政治”，傅斯年认为这种人最可恨，如果以“一种无聊的学问，其恶影响及于政治，自当在取缔之列”，政府须对“民族学”取“一个断然的立场”。^[54]依傅斯年所论，民族学自应在取缔之列。

然而，持论双方无论对错，历史已然做出了选择。傅斯年和顾颉刚对于“中华民族”的认识，正与国民政府倡导的民族政策相契。1942 年，蒋介石开始起草《中国之命运》书稿，其中第一章“中华民族的成长与发达”绝口不提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只认可“中华民族是多数种族融和而成的”，以“宗族”替代“民族”，把中国境内各族群比喻成“同一血统的大小宗支”，^[55]完全否认多民族的存在。《中国之命运》关于民族问题的论述，可视为国民政府民族政策工作纲领。既然来自政府层面的政治宣传不提“民族”，此后但凡牵涉到“民族”问题都用“边政”问题来替代。许文珊在《抗战以来中国史学之趋向》一文中就曾指出，傅斯年、顾颉刚以“热烈的情绪”呼吁“中华民族是一个”，此举影响了史学界的研究方向。至 1943 年蒋介石撰著《中国之命运》，用“宗族”二字称谓国内各民族，随后即被普遍使用，此举不仅“影响历史学术，也影响了民族心理，关系非常之大”。^[56]

在国内政治的压力下，杨成志和吴文藻开始重新考虑在保证民族学学科存在的前提下，不提“民族”概念，以适应国家的政治需求的问题。1941 年，杨成志发表《边政研究导论：十个应先认识的基本名词与意义》，成为国内构建“边政学”研究的第一人。在其对中国“边政学”的构建中，自始至终坚持由多学科参与，但民族学任“主角”的主张。^[57]1942 年，吴文藻又发表《边政学发凡》，提出从“理论”和“实用”两方面出发，政治学和人类学“同时着眼”，人类学是研究边疆民族文化的“中心科学”。^[58]杨、吴二人先后阐述“边政学”的理论，成为民国学界构筑“边政学”的源流，并非偶然现象。



注释:

- [1] 学界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讨论的文章主要有：葛兆光，《“中华民族是一个”：从1939年〈益世报〉上的争论说起》，《何为中国：疆域、民族、文化与历史》，牛津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黄克武，《民族主义的再发现：抗战时期中国朝野对“中华民族”的讨论》，《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4期；马戎，《如何认识“民族”和“中华民族”——回顾1939年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讨论》，《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周文玖、张锦鹏，《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学术论辩的考察》，《民族研究》2007年第3期；黄天华，《民族意识与国家观念：抗战前后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论争》，《一九四〇年代的中国》（下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李大龙，《对中华民族（国民）凝聚轨迹的理论解读——从梁启超、顾颉刚到费孝通》，《思想战线》2017年第3期。
- [2] 参见苏鸿宾，《暹罗改变国号之意义》，《南洋研究》1939年第8卷第3期。
- [3] 参见大江，《英日在暹罗的冲突》，《国际评论》1937年第1卷第4期；【美】怀亚特（Wyatt D. K.）著、郭继光译：《泰国史》，东方出版社2009年版，第358页。
- [4] 参见佚名，《日本南进政策与英日利害之冲突：日本与暹罗关系日趋密切》，《中外经济情报》1937年第187期。
- [5] 参见佚名，《投入法西斯怀抱的暹罗》，《杂志》1938年第3卷第1期。
- [6] 张凤岐，《暹罗改名“泰国”与中国西南泰族之前途》，《新动向》1939年第3卷第4期。
- [7] 转引自苏鸿宾，《暹罗改变国号之意义》，《南洋研究》1939年第8卷第3期。
- [8] 转引自乃迁，《暹罗改国名为泰国》，《世界知识》1939年第9卷第9期。
- [9] 傅斯年，《傅斯年致顾颉刚》，1939年2月1日，《傅斯年遗札》卷2，“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1年版，第953-955页。
- [10] 顾颉刚，《顾颉刚日记》卷4，1939年2月7日，台湾联经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197页。
- [11] 傅斯年，《傅斯年致顾颉刚》，1939年2月1日，《傅斯年遗札》卷2，第953-955页。
- [12] 陶云逵，《关于暹罗改国号为“泰”》，《益世报》1939年6月4日，第2版。
- [13] 陈序经，《暹罗与泰族》，《今日评论》1939年第2卷第1期。
- [14] 顾颉刚，《暹罗改国号与中国之关系》，《天文台》（香港）1939年9月14日，第2版。
- [15] 张凤岐，《暹罗改名“泰国”与中国西南泰族之前途》，《新动向》1939年第3卷第4期。
- [16] 顾颉刚，《中国人应注意暹罗的态度》（原载1939年11月5日《新中国日报》），《宝树园文存》卷4，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45~148页。
- [17] 参见周钟岳，《云南各夷族及其语言研究》，《新动向》1939年第3卷第3期；方国瑜：《僰人与白子》，《益世报》1939年10月2日，第4版。
- [18] 参见任坚，《暹罗排华的真象》，《新华日报》1939年10月4日，第2版。
- [19] 王连浩、陈勇，《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及知识界对大泰族主义之回应》，《南京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
- [20] 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益世报·边疆周刊》第9期，1939年2月13日，第4版。
- [21] 顾颉刚，《顾颉刚日记》卷4，1939年2月7日、9日，第197页。
- [22] 傅斯年，《中华民族是整个的》，《独立评论》1935年第181号。
- [23] 参见楚人，《中华民族是整个的》，《现代青年》1936年第5卷第3期；瀚，《中华民族是整个的》，《圣公会报》1936年第29卷第1期；王孟恕，《关于中小学史地教材的一个中心问题：“中华民族是整个的”》，《图书展望》1936年第4期。
- [24] 顾颉刚，《“中国本部”一名亟应废弃》（原文载1939年1月1日《益世报·星期评论》），《宝树园文存》卷4，第88-93页。
- [25] 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益世报·边疆周刊》第9期，1939年2月13日，第4版。
- [26] 参见费孝通，《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益世报·边疆周刊》第19期，1939年5月1日，第4版。
- [27] 周文玖、张锦鹏，《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学术论辩的考察》，《民族研究》2007年第3期。



- [28] 冯友兰,《历史与传统》,《冯友兰论人生》,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90—92页。
- [29] 顾颉刚,《续论“中华民国是一个”:答费孝通先生》,《益世报·边疆周刊》第20期,1939年5月8日,第4版。
- [30] 李绍明、王利平等,《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边疆和边政研究——李绍明先生访谈录》,《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年第12期。
- [31] 《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两种专号出版》,《申报》1928年7月4日,第5版。
- [32] 顾颉刚,《瑶山调查专号跋语》,《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1928年第46、47期合刊。
- [33] 杨成志,《杨成志自述》,高增德编:《世纪学人自述》卷2,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110页。
- [34] 杨成志,《杨成志致函傅斯年》,1930年7月20日,傅斯年档案:元64—9,台北傅斯年图书馆藏。
- [35] 傅斯年,《傅斯年致函朱家骅、杭立武》,1939年7月7日,《傅斯年遗札》卷2,“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1年版,第1013页。
- [36] 徐益棠,《十年来中国边疆民族研究之回顾与前瞻:为〈边政公论〉出版及中国民族学会七周年纪念而作》,《边政公论》1941年第1卷第5、6期合刊。
- [37] 参见王建民,《罗致平先生对中国民族学的贡献》,白翠琴编,《罗致平文选》,花城出版社2004年版,第452页。
- [38] 胡体乾,《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新动向》1939年第2卷第10期。
- [39] 杨成志,《西南边疆文化建设之三个建议》,《青年中国季刊》1939年创刊号。
- [40] 杨成志,《民族学与民族主义》,《民族文化》1942年第2卷第8、9期合刊。
- [41] 参见江应樑,《广东傜人之今昔观》,《民俗》1937年第1卷第3期。
- [42] 参见江应樑,《广东北江傜人的生活》,《东方杂志》1938年第35卷第11期。
- [43] 江应樑,《抗战中的西南民族问题》,中山文化教育馆1938年版,第14、15页。
- [44] 江应樑,《抗战中的西南民族问题》,第42页。
- [45] 徐益棠,《十年来中国边疆民族研究之回顾与前瞻:为〈边政公论〉出版及中国民族学会七周年纪念而作》,《边政公论》1941年第1卷第5、6期合刊。
- [46] 徐益棠,《车里摆夷的生命环(序)》,见陶云逵:《陶云逵民族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2012年版,第443页。
- [47] 傅斯年,《傅斯年致朱家骅、杭立武》,1939年7月7日,《傅斯年遗札》卷2,第1016页。
- [48] 徐益棠,《十年来中国边疆民族研究之回顾与前瞻:为〈边政公论〉出版及中国民族学会七周年纪念而作》,《边政公论》1941年第1卷第5、6期合刊。
- [49] 参见顾颉刚,《一九二六年始刊词》,《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1926年第2卷第13期。
- [50] 顾颉刚,《禹贡学会研究边疆学之旨趣》,1936年1月2日,《宝树园文存》卷4,第215页。
- [51] 顾颉刚,《发刊词》,《益世报·边疆周刊》第1期,1938年12月19日,第4版。
- [52] 顾颉刚,《〈顾颉刚文集〉第一册序录》,1944年11月7日,《宝树园文存》卷4,第14页。
- [53] 朱维铮,《顾颉刚从政》,《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09年4月19日,第5版。
- [54] 傅斯年,《傅斯年致朱家骅、杭立武》,1939年7月7日,《傅斯年遗札》卷2,第1015、1016页。
- [55] 蒋介石,《中国之命运》,正中书局1943年版,第1、2页。
- [56] 许文珊,《抗战以来中国史学之趋向》,孙本文等编:《战时中国学术》,正中书局印1946年版,第128页。
- [57] 汪洪亮,《民国时期的边政研究与民族学——从杨成志的一篇旧文说起》,《民族研究》2011年第4期。
- [58] 吴文藻,《边政学发凡》,《边政公论》1942年第1卷第5、6期。

